

大纪元

林辉：有多少人上了中共《约法八章》的当



相信了中共《约法八章》中的承诺的国民党将领、士兵以及企业家、普通民众，显然是上了个大当，换来的是中共对他们的杀戮、侮辱、迫害，而这正是由中共嗜杀的本性决定的。（网络图片）

更新: 2017-06-05 2:16 PM 标签: [国共内战](#), [约法八章](#), [国民党](#), [镇反运动](#)

【大纪元2017年06月05日讯】[国共内战](#)后期，尤其是1949年4月[国民党](#)失去南京后，中共在进攻上海前，毛泽东于4月25日再次以他和朱德的名义颁布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，又名《[约法八章](#)》，除了向全国广播外，还四处张贴。此前的1949年12月，中共军队在进攻北平前就发布过《约法八章》。

《约法八章》内容与其效用

《约法八章》的具体内容包括：一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，严惩反革命破坏。二、保护工商业继续生产。三、没收官僚资本，凡愿意继续服务者准予量材录用。四、保护医院、学校、体育等文化设施和公益事业。

五、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，凡属**国民党中央**、省、市、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，“国大”代表，立法、监察委员，参议员，警察人员，区镇乡保甲人员，凡不持枪抵抗、不阴谋破坏者，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，不加逮捕，不加侮辱。这些人员中，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，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。如有乘机破坏，偷盗，舞弊，携带公款、公物、档案潜逃，或拒不交代者，则须予以惩办。

六、一切散兵游勇，均应向当地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。凡自动投诚报到，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，概不追究。其有抗不报到，或隐藏武器者，即予逮捕查究。窝藏不报者，须受相当的处分。七、暂缓农村土改，城市的土地房屋，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。八、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

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大背景下，《约法八章》使国民党党政军各级人员选择了放下武器，放弃了抵抗，也使许多观望的包括商人在内的民众选择了留在大陆。

中共违背承诺镇压国民党将领

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，中共1949年建政后却大变脸，通过发起的一个又一个运动，戕害了众多国民党投共人员、企业家、知识份子和普通民众，其行为完全违背了《约法八章》。

根据百度提供的资料显示，1946年至1949年**国共内战**中，国民党先后有约177万官兵“投共”，其中将军大概有1,400名，包括驻守济南的吴化文、驻守北平的傅作义等。

对于部分“起义”、“投诚”的国民党高级将领，中共授以官爵厚禄，以收买人心，比如傅作义就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；而对于绝大多数这类将领，中共则通过“镇反”运动将之消灭。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。

事实上，在中共建政前后，即在中共的所谓新老解放区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镇压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做法。据中共官方统计，中共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

为“政治土匪”，约200万人，另有特务份子60万人，反动党团骨干60万人，共300万人。这些人大多数已在清匪反霸中被关、被管或被杀。

1950年3月和7月，唯恐杀得不够的中共中央先后两次下达了“镇压反革命”的指示。10月，则再次发出镇反指示，即有名的“双十指示”，警告各地纠正“宽大无边”的“右倾”倾向。“投诚”的国民党将领的厄运自此开始了。

在镇反运动中，被镇压的国民党将领大致分为如下几类：一、“投诚”后解职或被俘后释放返乡者；二、退役返乡数年、从事其它职业者；三、打游击而最终在“剿匪”战斗中被俘者；四、其他，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，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等。前两类人数最多。

第二类如国民党上将宋鹤庚，1923年即随谭延闿入粤投奔孙中山，并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。1952年1月，中共“湘乡县人民法庭”以宋鹤庚“曾充任匪军师长、军长、省建设厅长、上将参议等职，一贯危害人民，反抗革命……”等罪名判处死刑。实际上在1925年，宋就脱离军界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，1949年，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支，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，投奔中共地下武装。

在此期间，遇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包括：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王旭夫、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肖步鹏、第1兵团副司令刘进、第2兵团参谋长、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韩起功、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李本一、第10兵团副司令温怀光、第12集团军参谋长周址、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金亦吾、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王育成、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陈应龙、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尹作干、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李用章、新编第5军军长徐经济、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钟祖培、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曾宪成、第15军军长武庭麟、第20军副军长夏炯、第24军副军长向传义、第26军副军长、滇西师管区司令曹森、第27军军长刘孟廉、第28军军长刘秉哲、第29军军长、军事参议院参议张治公、第33军军长韩步洲、第34军军长高倬之、第44军军长陈春霖、第66军军长何绍南、第85军军长、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楚瀛、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王英、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谢灵石、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唐宪尧、国防部中将高参莫致宽、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邓玉麟、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夏之时……

除了上述遇害的部分军级将领外，师级、旅级等国民党军官遇害的也不少。因为名单甚长，无法一一列出。他们中绝大多数是“起义”或“投诚”的将领，或许当他们命丧中共枪下之时，才意识到当初自己的抉择是怎样的错误吧。

而1967年公开张贴的《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规定》（俗称公安六条）披露了文革前17年内部掌握的政策条款，即“反革命”的标准。其中除了现行罪犯以外，对于敌伪的反动党团骨干（国民党、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）、政（保长以上）、军（连长以上）、警（警长以上）、宪（宪兵以上）和特（特务人员），虽无刑事犯罪行为，一律按历史反革命处理。也就是说，从中央到基层，掌握的政策是追究所有国民党中央、省、市、县、乡、保党政军各级人员，除了极少数统战人物，几乎一律逮捕，并分别实施判刑、处死、劳改、监禁、管制。这其中又有多少人遭遇不测？

镇反运动究竟“杀”、“关”、“管”了多少人，毛泽东曾说杀了70万，关了120万，管了120万。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，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。

徐当时的报告称：镇反运动以来，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，其中“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名，关了129万余名，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。捕后因罪恶不大，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。”以被处决人数71.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，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二四的水准了。考虑到当时各地出现的瞒报情况，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.2万的这个数字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中共终于局部的承认了“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分起义投诚人员”这样一个事实。然而，由于上述数字还仅仅是由今日仍然在当权的中共所统计，到底有多少人被冤杀、冤判和残害，依然是个未解之谜。

发动“五反”运动 消灭企业家

1949后，中共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“地主”和镇反的同时，在城市中也开始了打着“五反”名义的消灭城乡民族“资产阶级”的工商改造运动。1952年1月，中共提出了针对企业家的“五反运动”，即“反对行贿、反对偷税漏税，反对盗骗国家财产，反对偷工减料，反对盗

窃经济情报”。2月上旬，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，很快掀起了改造“资产阶级”的高潮，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，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，有着众多的企业家。

靠着种种逼迫方法，在几年内，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民族企业家和私有制，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。可以说，“五反”实际上就是抢企业家的钱，甚至是谋财害命。

在“五反”运动中，上海到底有多少企业家自杀至今仍是个谜。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《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》的资料，在“三反五反”中，有32万3,100多人被逮捕，280余人自杀或失踪。在真实的数字无法披露之前，这个大概只能仅供参考吧。

结语

相信了中共《约法八章》中的承诺的国民党将领、士兵以及企业家、普通民众，显然是上了个大当，换来的是中共对他们的杀戮、侮辱、迫害，而这正是由中共嗜杀的本性决定的。诸多被披露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任何承诺，因为其撒谎成性，其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，换言之，谎言是维持中共统治的柱石。不过，毋庸置疑的是，靠谎言堆砌的政权，其结局只有一个：坍塌。

责任编辑：高义